

# 点亮“渔火”40年

## ——海堡老渔民延续文学社团的故事

本报记者 高海清 摄影 王世颀

枫樯的诗《那天，我叫它清明》，在4月7日《沧州日报》发表后，编辑部连接到电话，赞扬这首诗有真情实感，是一首久违的好诗。这一情景，一时在编辑部也成了新闻。于是，便有了采访枫樯与他的渔人诗社的行程。

黄骅海岸线上，从南到北有冯家堡、贾家堡、赵家堡、白家堡等24个堡，也就是24个渔村。40年前，渔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总是觉得生活缺点什么。

1983年4月7日，“水产公司的政工干部沈之祥和青年渔民杜吏仓来找我，他们几个写诗和写小说的业余作者，要成立一个渔火文学社。文学社的26名成员，分布在各个渔村，大都是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渔民和渔政干部。”时任黄骅文化馆创作组组长马建成在《渔火，就这样点亮了》中写到。

其实，近年来，枫樯在《沧州日报》发表的近十余首诗，每次都会有反响，但没有这次强烈。枫樯，原名王柱良，是渤海新区黄骅市南大港镇贾家堡村一位船长，出海30多年，写诗30多年，与海浪、与台风、与生死抗争30年。

约定采访时间，不容易。枫樯除了休渔期，几乎天天漂泊在大海上，最长两个月。4月份对于渔民来说，犹如农民的麦收季，这时各种海味最肥美。错过了，就再回不来了。

记者微信约定采访日期，回复说：“我在海上了，得有大风的日子才能在家，海上信号时断时续，有时能收到，但打不开。”

4月14日，记者收到微信：“我

16号回家，估计10点进港，24号大风，有一天的时间。”

### 二

走到60岁边上的王柱良，说起话来，还是那样的腼腆、害羞。他是渔火文学社的老社员，加入文学社后，写作激情高涨，当年就有多篇作品发表在《沧州日报》《渤海潮》等报刊。

“自从加入了文学社，在大海里精气神也足了。29岁当船长，大风大浪面前再害怕，也要在船员面前表现得心平气和，有时会给船员们朗诵一首自己写的诗。别看我这个性格，可是在海上家长作风很强，说一不二，因为在大海中行船只有听一个人的，才安全。”王柱良说。

后来，渔火文学社社长杜吏仓去了沧州，王柱良去了大连，100多名社员坚守的也不多了。没有诗的日子，生活变得寡淡起来。

2020年7月28日，王柱良组织张巨河、小辛家堡、李家堡、南排河、贾家堡、徐家堡、冯家堡等渔村的杜宝谦、杜立学、任荣平、任建春、王学智、王之文、杜立升等成立了“渔人诗社”。到现在出了6期微信公众号。

说起过去的风帆船，打开了王柱良的话匣子，“风帆船，利用风吹风帆产生的推力，与船底水的阻力，合力逆风而行。行走起来后，船只能靠风帆的角度与高低调节方向与速度。与人生一模一样。没有回头路。”

今年冬天，趁着海上淡季，王柱良把自己写过的诗歌整理出来，有两三百首之多，他要挑出精品来，自己印一个小册子。



石碑河入海口

### 三

17日，记者找到杜吏仓。1978年，杜吏仓到南排河黄骅港务局码头管理站工作。有了时间，便开始渴望一种文化的交流。

管理站对面水产公司的沈之祥和杜吏仓一样，喜欢读书写作，有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又结识了爱听函授课的李茂民。

1982年夏末的一天，沈之祥老师领着两个人对杜吏仓说：“这是诗人何香久，这是新华社记者李勤，他们来海堡体验生活。”

“我领他们到泊在码头港的船上，当起了讲解员，把渔民出海与风浪搏击的情景讲给他们听。他们劝我把这些以诗歌散文的形式写出来。”杜吏仓说。

杜吏仓读的唐诗宋词多，但是接触地新诗少。一天晚上，他打发老婆孩子睡去，自己把吃饭桌放在土炕上，点燃一支香烟，展开纸拿起笔，之前曾被他人蔑为“淡而乏

味”的新诗，直到抽了一盒烟，一行完整的句子都没写成。

“后来，县文化馆马建成老师来码头。他竟然是何香久的老师，我知道了，县里十分重视渔村文化。我骑着自行车沿着海岸到20多个渔村寻找爱读书的人。”

### 四

1983年7月1日，渔火文学社正式成立时，由最初的26名增加到百名社员。由杜吏仓任社长，马会凤、戴金鸿任副社长，他们凭着真诚和满腔的热情，渔火文学社在沧州沿海风生水起。

1985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用多国语言介绍了渔火文学社扎根海边、为广大渔民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的事迹。1986年，杜吏仓荣获沧州“狮风奖”诗歌一等奖，1987年，作为沧州的8位诗人之一，被收入《夏天的人音鼓》一书。

正如何香久在《渔火》创刊号发刊词里所说：“在我们的世界



三个老诗友：李升、李立学、李枫樯。

里，海，不仅仅是一个童话。她温柔，她粗犷，她蕴藏着人生的哲理。还有一支支我们的心点亮的闪烁的“渔火”。

李家堡的王世江，是渔火文学社社员，2008年，他创办了沧浪诗社，出版《沧浪诗刊》，延续了渔火文学社的光亮。

# 有大爱者方可成大家

## ——《黄胄作品欣赏暨杨秀坤画展》代前言

刘桂茂



校教育，都是以社会为自己的大学校，从中磨炼自己、寻找自己的表现手法。”三个“都是”告诉我们，他们一师徒在灵魂深处就是相通的，他们有着“先天”的共情。在黄胄先生被打成“反革命黑画家”、被骂成“驴贩子”的时候，杨秀坤“千里投师”，拜在黄胄门下，老师对学生是倾囊相授，学生对老师是一片深情，感情好得甚至让老师的亲儿子也感到嫉妒。老师为了艺术的追求和弘扬，开办了“炎黄艺术馆”，许多人说黄胄就是累死的呀。在先生去世后，杨秀坤为先生编辑出版了画集，撰写了许多回忆文章并结集为《在黄胄大师的教诲下》出版。秀坤不仅在艺术上得到了先生的真传，在为人处世上也向先生学习了许许多多。他对先生的感激那是刻骨铭心，回忆起老师的每一个细节他都热泪盈眶……然而，这一次他的流泪还非为此。

他是为自己的故乡而伤感吗？他的故乡确实给他种下了伤感的种子，这种伤悲是如此的深沉，今天不说也罢。然而，他对这片生他养他的热土一往情深。他和我说起离开老家10年后第一次回家的经历：二十出头一个毛头小伙子，坐三天三夜的火车到了泊头，再花一块二坐“二等”（在自行车后座上固定一只小椅座儿，作为载人的工具），回到自己的村子。后来有人问他：你在老家还有什么亲人吗？他回答没有了。那人问：那你回家看什么？他回答：我就是看看人，看看树，看看路，看看房子……那人冲他伸出大拇指，说：“爷们儿，你是好样的！”在他六十岁的

时候，他把花甲之年的大展献给了自己的家乡，60幅画作浸透了他的亲情。在他看来，王青庄——东光县——沧州市，是他根之所在。在这里，血缘意义上的亲人没有了，但是感情意义上的亲人遍地皆是。这些亲人随便哪一位的伤悲都会化为他的伤悲……然而这一次他的伤悲亦非为此。

这一次，他的热泪为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而流。这个农民的善良是中国绝大多数农民所共有的，这个农民的贫困也是当年的绝大多数农民所共有的。他在采访时因为饥饿难耐走进了这位农民的家，这家农民为他拿出了粗犷的食品，他却看到了这家农民生活的极度困窘。他哽咽着对我们说：“到了他家，我才知道什么叫家……徒……四壁……”理所当然的，这位农民会走进他的画



黄胄作品欣赏暨杨秀坤画展

儿里。

在莹莹的泪光里，他紧接着讲了另一个故事。他采访沂蒙山区的一位老太太，老太太对他说了：“你小心点啊，不要踩了我的小鸡。我买了十四只小鸡，死得就剩这两只了。”他看看其中一只小鸡在那里打蔫儿，心中十分酸楚，心里想：“大概这一只也活不过明天了吧。”于是他回去画了一幅画，题为《母亲》。老太太站在院子里，四周群鸡环绕……他要为老太太在图画里画一个养鸡梦。

他真正的大哭我没有机缘听到。但是，他用文字的泪水打湿了我的脸。那是汶川地震发生之后，他求去地震现场而不可得，根据报道创作了《来自天堂的短信》。那是一位母亲，在地震发生之时用自己的躯体护住了幼小的孩子。母亲死了，孩子被救出来，救援人员在孩子身边发现一个手机，手机上有一则短信：“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杨秀坤浓墨重彩画出了这个故事，已是凌晨四点。他挥笔写下了一段颇长的跋文，掷笔大哭……他把这幅画献给所有在地震中逝世的母亲。

他的泪水和故事像电光石火一样照亮了我的脸，我一下子看懂了他的全部画作，看懂了他画作中的大爱，大慈，大悯，大悲。画家当然要靠技术，但是，未与画中共歌哭者，不足以与言画！我看到过杨秀坤的一幅照片，画面是他在采风途中向一位老农民询问通往村的路途，题为《问路》。我以为，这实际是一则寓言。画家，广而言之任何艺术家，都要向人民“问路”，都要和人民同命运、共呼吸。做得到和做不到这一点，是画家和画匠的区别，是艺术家和艺术家的区别。杨秀坤的画作，笔墨如何好、章法怎样妙，自有专家评论，余一生从事新闻事业，对书画全然外行，何敢置喙焉。但是，他画作中的温度，我是感受到了的。

也希望正在看画的您能感受到。倘如是，您也就是这些画儿的知己了。

# 「活态展示」当代大运河精神

## 黄胄弟子杨秀坤画展二十八日将举办

本报讯（记者）28日，我市将在大运河畔运河曲舍举办“悠悠运河情，名家故里行”——杨秀坤画展，展出著名画家黄胄和他的弟子、沧州籍画家杨秀坤作品共计110余幅。同时，邀请国家画院著名画家、炎黄艺术馆著名画家和北京著名画家齐聚观展助力。

据了解，杨秀坤是沧州东光人，著名画家黄胄的学生。黄胄、杨秀坤以生命入画，用心造境，其画作是当代运河大运河精神的“活态展示”。他们始终坚定“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创作道路，提倡“生活、速写、创作”三位一体的创作理念，追求必攻不守的创作精神。二人曾多次深入河北、黑龙江、新疆、西藏等地采风创作，《塔吉克舞》《洪荒风雪》《我的父老乡亲》《梨花香里说丰年》等代表作，生动纯朴、神韵悠远，无不浸透着纯美乡情与人文关怀。两位画家几十年如一日饱蘸热情笔墨抒发对中华大地、中华儿女的深沉之爱，其社会活动与艺术实践对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这份东方神采也曾多次以个展、联展等形式扬名海外，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画研究院、炎黄艺术馆、巴基斯坦总统阿西夫·阿里·扎尔达里、巴基斯坦总理赛义德·优素福·拉扎·吉拉尼、阿根廷球王梅西等多部门及个人收藏。

本次画展由中国华夏文化遗产基金会、市委宣传部、市文联、市大运河办主办，市美协、运河曲舍承办。旨在展现运河乡土韵味，挖掘运河时代精神，开拓运河文化价值，切实丰富聊城百姓精神文化生活，构建提升市民生活品质的活态传承体验空间，进而提升沧州文化软实力、深化文化交流合作。这些笔墨精到、形神俱备、雅俗共赏的佳作是两位画家为沧州人民献上的一片赤诚，相信能让聊城百姓陶醉流连、感怀在心，激发出新时代慷慨激昂、热情洋溢的铿锵之音。



《榆园图》局部

位于山东省宁津县阳光大街中段的文化艺术中心三楼北边有一个纪念馆。主题人物就是晚清重臣南皮人张之洞的亲外甥李浚之。在宁津、南皮两座相邻的古城，舅甥同时拥有纪念馆，可谓巧合。

李浚之（1868年—1953年），号响泉，宁津县北曹塘村人，是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美术家、书画收藏及鉴赏家，曾任故宫博物院特聘顾问。

李浚之父亲李鑫与张之洞胞姊婚后育有三子：长子李淮之，官守御所千总，武德骑尉；李浚之行二，庠生，官至广灵知县，后卸职专门从事书画研究；三弟李沅之曾任知县。在众多晚辈中，张之洞很喜爱李浚之，不止一次说：响泉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日后必成大器，对他栽培教育有加。

1889年，张之洞由两广总督调任湖广总督，大力发展重工业，实施“新政”。用人之际，张之洞身边聚集了大量人才，仅南皮、宁津籍人员就有百余人，李浚之就是其中之一。受舅父派遣，李浚之从天津出发，东渡日本考察洋务。用了5个月的时间考察日本工商业、教育、法律、政治等，回国后撰写《东隅琐记》刊印出版，在国内引起很大反响。

1920年，李浚之卸职回乡，在宁津城西何庄置田百亩，修建“榆园”。园内植榆万株，亭台水榭，花苑走廊，环境优美、典雅有致。李浚之堂兄李清芬为此绘《榆园图》一幅，吴昌硕、华世奎、刘家琛等40余位名家为之吟诗作赋，后辑成《榆园题咏》出版。1933年，李浚之购得“君子”馆汉砖，把各地名士题写的诗文集《君子留真谱》，由状元刘春霖题写书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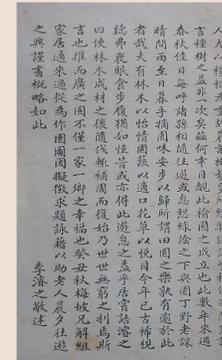
李浚之博学多才，豪爽侠义，广结天下名士，每天门庭若市，文人雅士络绎不绝。后受聘为故宫博物院顾问，长期从事书画鉴赏。经40年积累，早年访友，广事搜集，他辑成30余万字的《清画家诗史》，辑录画诗4000余（幅）首，不惜重金雕版711块，并付印成书。1983年，《清画家诗史》再版，启功先生在题序中写到：“响泉先生特立独行，表率近世艺林数十年，昔曾求教，海内拳拳，所著画家诗史，以人存诗，以诗存画，权衡精密……”

李浚之不但精鉴赏，还富收藏，在京西城区小石作胡同，藏品占室七间，1947年因雇员酒后不慎失火，藏品付之一炬。唯《清画家诗史》木刻板因藏于书局，才逃过一劫。

李浚之一边从事金石鉴赏，一边授子子女书画技艺。除长子李树义（纪晓岚重孙女婿）在天津从事中医外，次子李树志、女儿李树萱游历名山大川，拜名师，最终成为绘画名家，成绩斐然。

李浚之的女儿李树萱（1913年—2011年），字冷云，名画家。1953年毕业于北京私立京华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师从张大千、黄宾虹，其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南海、毛泽东纪念馆、大英博物馆等处收藏，曾任荣宝斋画师。1953年，毛泽东60华诞之际，李树萱与齐白石、王雪涛、李可染等百名画家，每人画一幅作品献给毛主席，表达祝福。1987年，她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画展，对自己的艺术创作，做了阶段性总结。

李浚之的书画收藏，还富收藏，在京西城区小石作胡同，藏品占室七间，1947年因雇员酒后不慎失火，藏品付之一炬。唯《清画家诗史》木刻板因藏于书局，才逃过一劫。



李浚之《榆园图》局部